

闲读地名

文/茶客妻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过:“地名是一种历史的记忆,民族的追思,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

名离开地,则无所依;地离开名,则无所指。地名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人息息相关。它就像人类社会发展的化石,具有承载、积淀和传播文化信息的功能。

一个看似普通的地名,深究起来,会发现里面蕴含着很多文化信息。举个身边的地名例子。

“新街”是我们萧山的一个街道,满打满算,新街成街得名不过七十年。现在新街所在的地方,早先叫长山,也叫“荏山”,据说越王勾践在此地种过荏草。长山西端叫“长山头”,东端叫“山末址”,这种叫法很容易让人把长山看成是一个躺着的巨人,头西脚东。长山头一直很热闹,山末址要到1946年之后才开始成市。1946年前,山末址仅有一家豆腐店,一家理发店,一家绉鞋店,连荒村野地常见的茶店,当时也只有一家。1946年农历六月十六,钱塘江发生大坍江,仅一天一夜,就有三百米土地坍进江里。头蓬、三岔埭、小泗埠的部分商户逃难南来,在山末址购买荒地,搭舍建屋。当时的山末址地广人稀,农民以种棉花、小麦为主,迁入的商户因地制宜,大多开设花粮店,到1947年,开业的有建记、童吉祥、金松盛等7家。还有油烛杂货业3家、肉店2家,南货、棉百、山货各1家。昔日萧条的山末址开始有了集市的框架。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4月,山末址这个地方逐渐形成了以供销社为主体的商业网络,街市规模初步形成。为区别于“长山头”老街,故称此地为“新街”——新兴的街市。

从新街的得名,我们可以看出,地名是某一特定区域文化、地理位置及风土人情等综合因素的直接反映。

站在地图面前,放眼全国各大城市,其地名的由来大致不外乎这三种:从地理层面考量,从人文层面考量,从复合层面考量。

从地理层面考量的地名,最多的,是以自然地理环境特点命名,如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山东山西,不用笔者多说大家都心知肚明。需要稍加说明的,如那些带“阳”字的诸如洛阳、庆阳、辽阳、咸阳、阜阳、松阳等城市,其所在地,不是在山的南面就是在水的北面。同样,那些地名带“阴”字的,如汝阴、蒙阴之类,则其所在地,肯定是在山的北面水的南岸。“阴阳”是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一阴一阳谓之道,落实在地名上,既体现其地理环境,又充满了哲学意味。

从人文层面考量,则以历史和传说命名为多,如中山、邢台、晋城、邯郸、黄山、孝感等。中山乃是为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而设;邢台和晋城,是因为春秋时候邢国和晋国就在这里,邯郸则是战国时候赵国的都城;黄山是传说中黄帝白日飞升之地;孝感则从董永孝行感天而来。

从复合层面考量,这种地名来历应该说是最广的。天津、保定、长治、吉安是表吉祥祝福的;武汉、三沙、乐昌、番禺、三明是表明此地由几个城市合并而来;呼伦贝尔和高雄皆由外来语得名,前者是蒙古语,后者是日语;运城由经济得名,它是国家转运食盐之地;宜春、宜阳、信阳、邵阳等地名,则是为了避帝王之名讳而改定。

中国有五千年的灿烂历史,广袤的国土上,各种地名星罗棋布,让人充满遐思遐想。

有空的时候读读地名,不失为一种精神享受。

萧山有位“清吟阁主”

——晚清藏书家瞿世瑛籍贯一考

文/余逸成



“嘉庆辛酉年二月十九日辰时”,即1801年3月24日上午;逝于“咸丰九年己未三月廿五日卯时”,即1859年4月19日清晨(也载有其夫人张氏的生卒年月),葬于龙井风篁岭(今属杭州),一目了然。

而后回溯瞿之祖上,所知就更丰了。原来瞿世瑛一支本于宋乾道元年由金华永康迁居萧山,始祖名元,因随其子瞿善至越州萧邑任教谕,又爱当地风水,便定居孝悌乡(今大桥村一带)玉泉溪,此后落地生根,历经数代而渐成当地望族,至世瑛已是第二十五世,此间各支系均多功名之士,早年陆续有任钱塘县尉、福州州判等职务的同宗先人。此外迁居情况也记载清楚,瞿世瑛一支乃由其曾祖瞿溯起,从萧山东门外至江南吴县(今苏州吴中区),再至徽州休宁县(今属黄山市),后其父瞿塘又迁回钱塘县(今杭州)。

瞿祖父名国龙,字敏文,“诰封朝议大夫候选监运司运同,诰赠通奉大夫道衔候选知府加三级”,逝后葬于杭州地区。

瞿父名塘,字大昌,号素园,“太学生,嵇务报效藏馆议叙府同知,捐升监运司运同加二级,诰封朝议大夫,晋赠通奉大夫道衔候选知府加三级”,逝后葬于杭州城外。

由此可见,瞿世瑛父辈为未任实职的官绅,乃杭城的文化世家。再顺流查阅其后人,得知瞿有五子,次子传管过继其弟,幼子早逝;三女,均许配官宦士绅之家。这些后辈中,长子瞿传鼎(1820—1860)颇值得一提。

传鼎,字伯彝,号颐斋。“仁和庠生加捐

国子监典籍,报效军需议叙,即补光禄寺署正,钦赏蓝翎,殉难,恩赏加员外郎衔荫一子入监读书,期满以知县用,诰授奉直大夫。”今可知其曾为剧本《桃溪雪》正谱,而乃父又曾为剧作家黄燮清作品《茂陵弦》作序,言辞华美,可见家中戏剧之好也有传承。《浙江忠义录》有载:“鼎性孝友,富而好义,军兴数年,捐饷至数十万。咸丰庚申春二月,杭州城陷,携妻李同沉于井,赐恤员外郎衔”,正是其生平。

更值得一提的是其长婿,竟是编撰过《萧山儒学志》《湘湖水利志》等书的鲁燮光(1817—1911)。

“燮光,字瑶仙,晚号卓叟”——《萧山县志稿》记载了鲁的基本资料,此不详述。只需知其与当时政要翁同龢来往密切便可知白其身份、家世颇不寻常,且收藏丰富,在金石书画上能同罗振玉辈玩笑(罗氏《诵庐日札》曾记为鲁以赝砖耍笑一事),水平可见一斑,与瞿家正门当户对。

瞿所处的年代,文人学者在民间地位极高。他们一方面参与时尚文化的创造,一方面又保持传统的文雅作风,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尚,而且这并非为功名在身的士子占有,身家富足又具空闲之人亦多涉入其间,瞿于这两类情况均相符。一者,宗谱载其曾捐官职(这也表明了家资之丰);再者,《武林藏书录》还说他“家虽素封,迹若寒素。”即家中无真正官爵但十分富有,而日常生活又十分素简,富有者观其藏书一目了然,寒素想必是低调为人,门风简朴之故了。

至于后人一般以为他是钱塘人士,大概是“清吟阁”所在的缘故了。



位于清吟巷的王文韶大学士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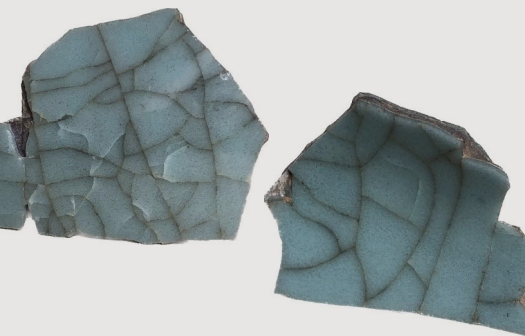
老汪说宋瓷

郊坛下南宋官窑的尘封往事

文/图 汪少一

在识古寻古的世界里,怎样的学富五车都不过是沧海一粟,怎样的悲欢离合都不过是弹指一瞬。那曾经繁华,曾经枯寂的南宋官窑,却在寻古后人那不经意的一瞥、一弯腰中,徐徐揭开尘封七百多年的往事。

杭州的南宋官窑有两处,一处是郊坛下南宋官窑,另一处是修内司南宋官窑,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两处官窑相距约五里远。



早年杭州卷烟厂工地所出南宋官窑瓷片标本

东边的修内司南宋官窑,当时跟南宋皇城的北城墙只有一百多米的距离。每逢初秋,窑火点起,宫墙内常常可见升起的窑烟。逢西北风起时,松枝燃烧的淡淡香味偶尔传至宫廷,从墙外带来几分民间的气息。

西边的郊坛下南宋官窑,与八卦田相邻。八卦田曾是南宋皇家籍田的遗址。据史书记载,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宋高宗赵构为表示对农事的尊重和对丰收的祈祷,采纳了礼部官员的提议,开辟籍田于国都南郊,即现在的八卦田遗址。每年春耕时,皇帝率文武百官到此举行开犁仪式。

通常,窑址都选在远离皇宫甚至远离京城的地方,而杭州的两处南宋官窑窑址都设在皇家禁区之内,这在中国陶瓷史上也是独一份的存在。

说起杭州南宋官窑的发现,特别有意思。若说这两处官窑都是捡瓷片的人捡出来的,一点也不夸张。先捡出来的是郊坛下南宋官窑,后捡出来的是老虎洞修内司南宋官窑。而两处南宋官窑的发现,前后持续有70年之久。

今天先说郊坛下吧。那还是二十世纪二三

十年代,杭州有一些民间古陶瓷爱好者或学者在寻踪历史古迹时,有的在凤凰山腰捡到了一些南宋官窑瓷片,有的在山脚下也捡到了。这并不关紧,关键是还捡到了一些带支钉的支饼和不带支钉的垫饼,这都是窑具。

世俗地讲,瓷片值钱,窑具并不值钱。可是,往往是并不值钱的东西却决定着事情的走向。这些窑具的发现,就像偷萝卜的人看到了萝卜缨一样,直觉似乎在告诉人们,这离南宋官窑的发现不远了。

说到这里,有一个我们不愿意提到的人出现了。他是时任日本驻杭总领事米内山庸夫,他对中国古陶瓷很感兴趣,当听到民间有人捡到南宋官窑瓷片的消息,也从当时凤凰山的报国寺和地藏殿等地,采集到了不少官窑瓷片和窑具标本,后来带回了日本。再后来,他的这些标本成为日本四五家博物馆的重要馆藏,很多日本人对南宋官窑的认知,就是站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好在,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周仁先生差不多也是在那段时期,好几次到杭州凤凰山一带做了调查与试掘工作,并撰有《发掘杭州南宋

官窑报告书》。同样是在那几年,当时的法律专家、兼攻金石陶瓷学的朱鸿达先生也将杭州采集的标本,编成了《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

限于当时的认知,米内山庸夫把一些龙泉瓷片当成了南宋官窑片。而朱鸿达先生也把郊坛下官窑当成了史书上记载的修内司官窑。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正好说明人们对南宋官窑的认识,是一个在实践中循序渐进的过程。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较早地明确郊坛下南宋官窑的提法。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对郊坛下南宋官窑进行了初次发掘。到了1985年10月,由多个部门参与组成的南宋临安城考古队对郊坛下南宋官窑进行了正式发掘,此次发掘持续到1986年1月底结束。

经过这两次发掘,基本上解决了郊坛下南宋官窑的重要学术问题。可是,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来了。因为史书上明确记载,南宋官窑先有内窑,后有郊窑,也就是说南宋官窑前后有两处。可是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一处,另一处藏在何方?又经历了哪些曲折呢?且待下次再说。